

《高晓声的文学世界》述评

韩斌生

(常州文化艺术研究所, 江苏 常州 233000)

摘要: 朱净之所著《高晓声的文学世界》是研究高晓声文学业绩的最新学术成果。作者不止对高晓声的文学世界作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评述, 甚至包括那些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作品和史料, 都尽力搜寻, 一一介绍点评, 而且对高晓声的感情世界也有至深至详的叙写。其写作态度之认真, 资料搜集之勤勉, 可谓辛苦备至、令人动容。朱著内容构架大而全, 系统而不失严密。苦涩味、冷幽默和武进方言味, 正是高氏小说的个性化艺术特色。朱著不仅达到甚至超越了作者起初为自己设置的追求目标: 不追求专题的精到和学术的高深, 只追求完整性、普及性和可读性的述评效果, 止于让读者认知、理解曾经饮誉中外文坛的真实的、具体的、可亲可敬但并不完美的一代名家高晓声。

关键词: 述评; 高晓声; 文学作品; 感情世界

中图分类号: J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5) 06-0094-03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6.017

朱净之所著《高晓声的文学世界》一书, 是研究高晓声文学业绩的最新成果。作者不止对于高晓声的文学世界作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评述, 甚至包括那些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些作品和史料, 都尽力搜寻, 一一介绍点评, 而且对于高晓声的感情世界也有着至深至详的评传性叙写。其写作态度之认真, 资料搜集用力之勤勉, 可谓辛苦备至、令人动容。

高晓声是新时期崛起的农村题材小说大家。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 农村题材小说是收获成果最丰的一个领域。因为从本质上来讲, 我们本是一个农民的国家, 无论农村天地之广, 农民人数之众, 都为世界之最, 即使农民进了城, 其小生产人格素质的沿袭依然是长期的。因之我们的作家也大都来自农村。对于农民意识的不其然而地欣赏, 对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情感依恋, 在这些作家笔下, 几乎是血浓与水、油然而生。高晓声自然也不例外, 他和江南农民水乳交融般地长期患难与共, 使其在表现江南农村生活和塑造江南农民形象时, 笔下充满底气, 充满感情。由于出身党的新闻工作者, 他对于时代变迁有着敏锐感触, 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江南农村底层的作家, 他对于江南农民心理和苦乐生涯的深入开掘, 对于常州武进地方特色吴语的纯熟运用, 都使得他的农村题材小说, 无论生活内容

的开掘深度, 还是农家人物形象典型化塑造的鲜活程度, 乃至地方语言运用之纯熟老练, 皆似水到渠成, 堪称大家手笔。

高晓声与农村题材创作先行者赵树理、柳青诸位大家显然不同。赵树理是长期深入解放区农村, 以“久”著称的。久则与底层农民“亲”, 久则对于农村生活琐细了解“全”, 久则对于农村生活底蕴“通”, 久则对于农村生活素材更富于概括力即谓之“约”。因之他笔下的小二黑、小芹就塑造得活灵活现, 而对于二诸葛和三仙姑的针砭也显得叫人啼笑皆非。柳青深入生活的经验是“化”, 即农民化。他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 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几十年,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站在长安庄稼人堆里是无法分辨谁是作家谁是农民的。而高晓声不然, 他是一下子被作为劳改对象掀到农村生活最底层, 被彻底淹没, 一度几乎被认为是“死”去一般, 当然这里的“死”更指创作的心已近死去。他可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从早年的“探求者宣言”到改革开放初年他又娓娓叙说“摆渡”, 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相继在全国夺魁, 沉寂了几十年、死去活来的高晓声文思泉涌, 硕果累累, 声震文坛, 掀起了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的“高晓声现象”。仅此一举, 谓之短篇小说大家即当之无愧。

* 收稿日期: 2015-12-28

作者简介: 韩斌生 (1943—), 男, 陕西西安人, 研究员, 文学评论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确，论及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高晓声及其作品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从阿 Q、祥林嫂到小二黑、三仙姑，到梁生宝、梁三老汉，再到李顺大、陈奂生，乃至蓝脸和洪泰岳。我以为，鲁迅、赵树理、柳青、高晓声、莫言几位无疑是我国二十世纪百年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或者说乡土叙事文学的领军人物。

朱净之原系常州大学的文科教师，主讲写作课 20 年，又是一个涉猎面颇广的写作高手，现为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为了写好这第一本高晓声文学评传，从熟悉高晓声的生平事迹到搜寻他的全部作品，乃至对其深入研读探讨，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我受命编撰《高晓声的文学世界》，历时两年，研读了 200 多万字的高氏原著和数百万字的研究资料，写成了这个 30 万字的书稿，力求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式，用雅俗共赏、平白晓畅的笔墨，来解读从常州走出去的大作家高晓声及其文学作品，勾勒作家文学人生和文学成就的全貌，不追求专题的精到和学术的高深，只追求完整性、普及性和可读性的述评效果，止于让读者认知、理解曾经饮誉中、外文坛的真实的、具体的、可亲可敬但并不完美的一代名家高晓声。”当然，这本书同时也凝聚了常州市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成员集体的智慧和友谊的结晶。特别是编撰《高晓声编年事略》的毛定海先生，他与朱净之的课题是姊妹篇。在研究和撰稿过程中，他们时有交流切磋、信息分享，不少资料相互提供、补充和参证。还必须特别提及的是，高晓声移居日本的大女儿高腊英、三女儿高雪英回国探母期间，接待了朱净之的访谈，讲述了当年她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情景和对父亲为文为人的理解和深情，提供了在日本出版的由天野·节先生翻译的高氏小说集《摆渡》和纪念文章，还发送一组家里收藏的有关她父亲的珍贵照片给朱净之，为朱净之的研究成果增添了不少新意和亮色。

朱净之的《高晓声的文学世界》一书的内容构架可谓大而全。说其“大”，是就其纵的续写高晓声文学人生的气魄之大、囊括面之深广而言的，从文学梦、获罪于文学、炼狱般文学生涯、文学新时期的“井喷”、文学情缘、直至文星陨落，一以贯之，尽在观览之中。而言其“全”，是从横的概括来看，除文学人生，还涉及文学创作、文学价值各个侧面，一一论列。如创作就不只说到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随笔

乃至诗歌、戏剧、创作谈、文学名著点评，无一遗漏；而文学价值亦从文学传承到创作观、历史价值、艺术特色等，面面俱“道”，系统而不失严密。关于高晓声的文学人生和创作成就，文学前辈陈椿年在该书“序一”中说道：“再说高晓声，人们通常以为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得益于他有‘倒霉’二十二年间的农村生活。这话当然也对，但很不够。以我之见，他之所以能写出陈奂生、李顺大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写出‘摆渡’之类的散文，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倒霉二十二年’里积累了很多独立的观察、思考和感悟，这些才是他那些文字的靈魂所在。”如果我们翻阅高晓声复出后的全部作品，的确不难感受到他的字里行间有着一一种触发人们联想和思考的力量。这正是高晓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气息和光泽。

高晓声的现实主义，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雅人深致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那种抱着悲悯同情之心精细地深入观察农家生活的典型细节的文化人的现实主义。他自己这样说：“几十年来，我在生活中形成的美学观念，着重于如何有饭吃，如何有衣穿，如何有屋住”，困扰心头就是“柴、米、油、盐，外加一顶帽子”。（见《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第 27 页）他这种紧接地气且与农民生计水乳交融的现实主义美学观，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朱净之对于这一中心命题在书中这样评价说：“高晓声的小说代表作几乎都是在‘替农民说话’，是在艺术地探求农民命运，强烈地表现新旧交替时代农民的苦衷、爱憎和期望。他替农民说话的小说，恪守着用艺术形象说话的准则，通过干预农民的灵魂来达到反作用生活的目的。”

高晓声作品所塑造的农民形象，家喻户晓的就是陈奂生这一成功的农民典型了。

这一人物典型的最精彩表现应在《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中。关于此，作者在书中评述道：“这篇小说没有采用一般作品通常使用的辛辣讽刺方式来暴露、谴责官僚主义如何可卑可恶，而是以寓深情于风趣的笔墨，含蓄巧妙地提出了当前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位县委吴楚书记关心群众的品德是可贵的，因为这种传统的美德被‘文革’破坏和扭曲，以致给陈奂生带来新的困境，却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干部关心群众的优良传统正在恢复，而其中不免仍带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灰尘。这种现象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陈奂

生在新的困境中,他那令人发笑的性格画面里,又藏着新时期‘这一个’农民多么淳朴真实的精神风貌,他始终没有埋怨吴书记对他的‘高级关心’,相反,却引以为豪;甚至街上人也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些文字决不是可以一览余的。它给读者留下了深沉思索和咀嚼的余地。《陈奂生上城》受到读者喜爱之后,陈奂生就成了高晓声手下有新闻价值的明星演员,因此他尽量找机会让陈奂生登台演出,以提高‘卖座率’,于是又有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系列小说的诞生。”

实事求是地讲,这段话虽说未必多么精到和深刻,但却道出了陈奂生这一形象的性格内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朱净之对于高晓声小说农民形象的时代典型意义有着比较深入的开掘。他说:“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奂生、刘兴大、江坤大等一系列农民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政治和封建思想残余得以蔓延的民族‘劣根性’温床。这样,高晓声就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的探讨。”他进而接着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优秀的民族,也是传统思想因袭极为深重的民族,遗存下来许多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不仅存在于农民身上,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社会阶层、社会个体的灵魂深处和下意识的思维定势之中。一个人以至于一个民族要否定自己而后自新自强,过程是十分困难和漫长的。而像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而且一直以‘大中华’自居的老大民族,要实现这个质变过程就更难了。认清并公认我们民族的长处和短处,并不表示我们自轻自贱,而是表示我们的自悟、自信和自强。高晓声小说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就在于揭示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的正、负两面,并图唤醒人们的理性而自觉地思考和实践。”

朱净之接下来还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分析道:“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群像,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这不仅是高晓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小说在思想主题方面的精到之处。他的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敏锐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身上既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勤劳、忠厚的传统美

德,也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

关于高晓声作品的艺术特色,朱净之在评传中强调了高晓声小说的苦涩味和冷幽默,而这再加上他的武进方言味正是高晓声小说艺术的个性化特色,是高晓声小说之为高晓声而非他人之作的独到之处。我多年前是亲自目睹且聆听过高晓声用地道的武进方言朗读其小说的令人陶醉的音容笑貌的,那种听读小说的韵味实在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在评传中举例说,高晓声在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中描写1958年大跃进这样写:上面要求社员贡献一百块砖头,只隔两天,又要一百块,过几天又要一百块,大跃进对物资的需求是大量的,只有依靠群众了,弄得有的人到河里去捞,到屋上、坟头上去拆,到早已塌光的屋上挖,再没办法,就想到砖砌的猪圈和兔子栅可以改用竹、木栏栅或土结;如果有围墙或幔壁拆就更幸福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多做贡献……人民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们对自己有实事求是的估价,知道自己没有力量解放自己,自己能够解放全靠“救星”。

正如作者所评说的那样:高晓声在“批判现实中,他善于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大词小用、庄词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倾泻政论激情,产生不周凡响的讽刺力量,透露作者寓贬于褒的审美态度。”

总之,这本评传不仅达到甚至超越了作者起初为自己设置的追求目标,“不追求专题的精到和学术的高深,只追求完整性、普及性和可读性的述评效果,止于让读者认知、理解曾经赞誉中、外文坛的真实的、具体的、可亲可敬但并不一定完美的一代名家高晓声。”至于评传中对高晓声情感世界的细腻解读,见仁见智,颇多生平传记浪漫色彩,限于篇幅不宜一一罗列,还是让读者自己去书中细细品味领略为好。

我与朱净之先生为多年文坛挚友,知其人读其文,倍感亲切。今读其新著,不时为其中一些精彩见解和文字打动,仿佛与其一起在高晓声的文学世界里浏览了一番,感触良多,简付与笔,概而言之,该书是较为全面地述评高晓声其人其作乃至其情感世界的最新成果,可喜可贺。

时短事冗,匆匆研读,草成此文,难免挂一漏万,愿与同道共勉,是为书评。

2015年12月5日写就于常州秋水云庐花园

(责任编辑:朱世龙)